

主编：沈志华、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八编 文化大革命

主编：何 慧

第九编 中苏关系

主编：何 妍



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2007DTQ001)
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B406)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八编 文化大革命

主编：何 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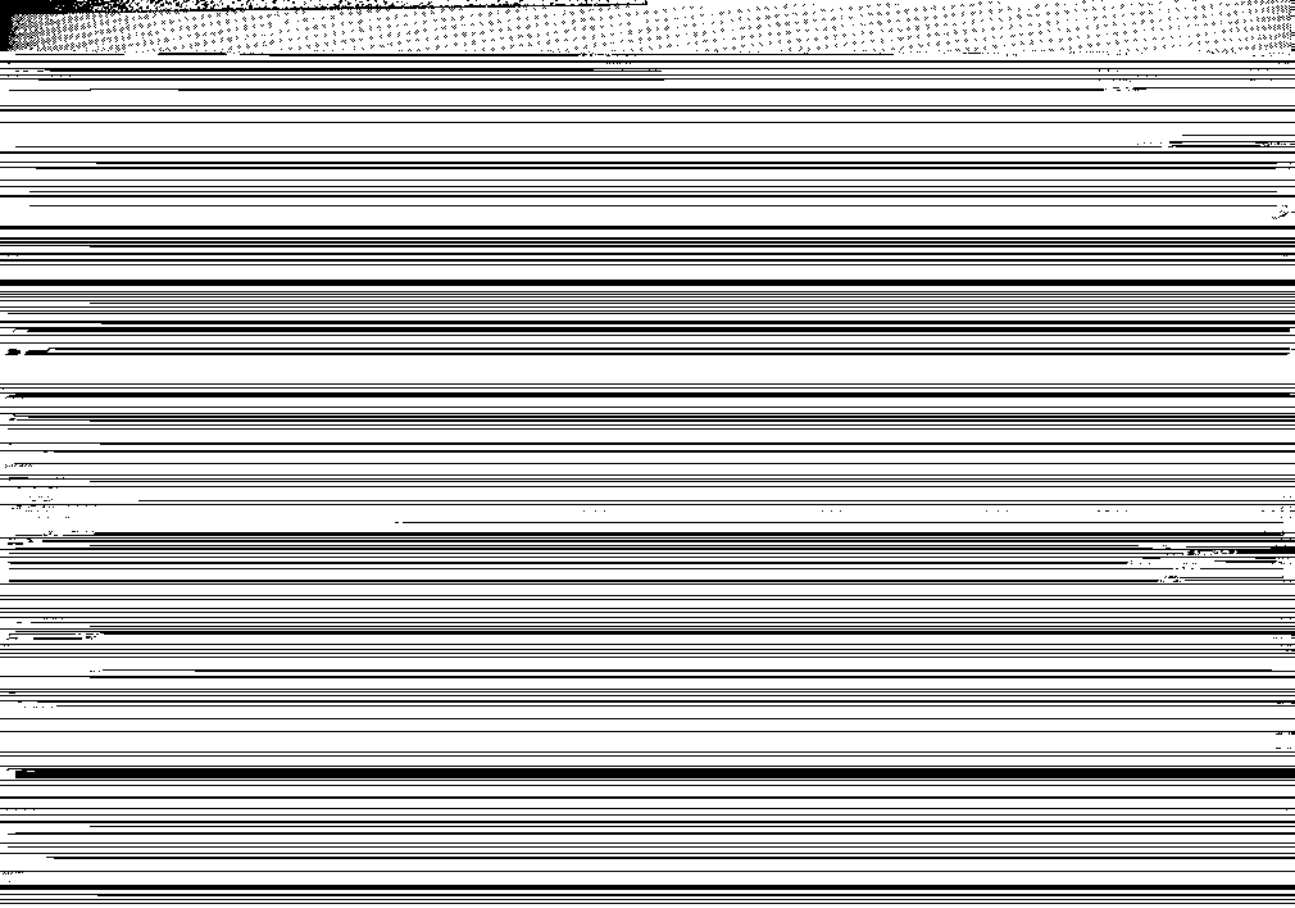
第九编 中苏关系

主编：何 妍



东方出版中心

第八编 文化大革命



目 录

导论 何 慧 / 5

- 8-1 中情局关于毛泽东做喉癌手术的情报信息电报(1966年4月15日) / 21
- 8-2 中情局关于“文革”初期政治斗争的情报信息电报(1966年7月25日) / 22
- 8-3 中情局关于在北京获取外国媒体信息的情报报告(1966年9月14日) / 24
- 8-4 中情局关于“文革”动乱致国家评估委员会的特别备忘录(1966年9月23日) / 26
- 8-5 中情局关于林彪地位的特别报告(1966年9月23日) / 29
- 8-6 中情局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分化的情报信息电报(1967年1月19日) / 37
- 8-7 中情局关于红卫兵谴责刘少奇的情报信息电报(1967年1月31日) / 40
- 8-8 中情局关于“文革”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情报备忘录(1967年2月) / 43
- 8-9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主任关于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致国务卿的报告(1967年3月1日) / 49
- 8-10 中情局关于毛泽东“老态龙钟”的情报信息电报(1967年3月2日) / 52
- 8-11 中情局关于“文革”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情报备忘录(1967年3月) / 53
- 8-12 中情局关于“文革”动乱及政治斗争的情报备忘录(1967年4月25日) / 59
- 8-13 中情局关于中国“文革”的国家情报评估(1967年5月25日) / 91
- 8-14 中情局关于“文革”对中国外贸影响的情报备忘录(1967年6月2日) / 101
- 8-15 中情局关于“文革”波及香港的情报备忘录(1967年7月11日) / 106
- 8-16 中情局关于中国大陆局势对香港影响的情报备忘录(1967年8月25日) / 111
- 8-17 中情局关于周恩来与“文革”的特别报告(1967年9月8日) / 116
- 8-18 中情局关于中国局势和前景的国家情报评估(1968年5月23日) / 122
- 8-19 中情局关于中国社会秩序混乱的特别报告(1968年7月19日) / 133
- 8-20 中情局关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矛盾的特别报告(1968年9月20日) / 143
- 8-21 中情局关于中国政治安全体制的情报报告(1969年11月28日) / 151



导 论

何 慧

本编收录了 21 份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美国情报及评估文件，它们是从 100 多份相关文件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中国领导人、党内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观察、分析和评估。其中，关于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观察和分析最多，包括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他们在“文革”中的地位变化、彼此的合作与分歧等。还包括对中国某些特殊的政治制度的观察，如中央情报局对中共“政治安全体制”的观察和评估就厚达近百页。其次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如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学生参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社会上出现的混乱局面等。再次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如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这些评估涉及“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对中国当时的形势做出基本判断的同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发展。

一、本编情报形成的相关背景

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都有对外国进行研究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部门。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它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关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它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协调美国的对外情报工作，如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并以《国家情报每日简报》的形式发送给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而更为详细的《总统每日简报》则会每天送到白宫，作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除此之外，还有由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做的评估报告。

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又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重要国家，因此，美国关于中国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关为了获取有关中国的情报，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除了招募代理人外，还包括使用飞越中国领空的卫星，在中国周边地区设立监听站，用潜艇对深海通信电缆进行窃听等。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没有外交渠道，也没有其他经济、文化的往来，因此，美国收集关于中国的情报的直接途径相当少，间接的途径则导致信息散乱及消息源不可靠，因而使情报不准确。这使得美国的情报评估报告中经常出现诸如“手头上没有确切的信息可得出结论”、“不能确定”这样的文字，表明其不少情报无法从多个渠道予以证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的情报部门主要是在靠近中国大陆的香港、澳门设立机构，从那些过往中国的外交人员、游客、商人那里收集各类信息。他们在想方设法获取各种正式文件的同时，也尽量收集各式各样的出版物，特别是大量红卫兵的报纸以及各地的大字报、小

字报。由于“文革”期间众多对立的派别互相攻讦,彼此大揭对方的老底,从而披露了相当多的不可能从官方的公开宣传中得到的信息,所以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这些大字报、小字报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字报是美国情报部门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基于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在“文革”期间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中国的政治形势及走向是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本编文件的重点。

本编收入的情报档案有一部分是普通的情报信息电报,它们属于常规的信息汇报,主要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渠道,也有少数是来自国务院的网络,其来源基本上都还没有解密。通常情况下,它们只是直接叙述情报内容,一般不做评论,而且这些情报电报都显得比较粗糙。例如,本编8-3文件,其内容是一般的中国人如何获取外国信息,它指出,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普通的中国人很难了解外国的情况,只有那些有一定级别的人才有资格阅读《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这两种摘登外国报刊的内部出版物,而有特别的工作需要的人才能通过阅读外国的报纸,收听外国电台来获取外国媒体上的信息。这些其实非常普通的常识性的东西在美国的情报报告中也不时出现,可见其情报并非都是关于重大事项或高端秘密的信息。在所有情报中这一类情报的数量是最多的,它们就好比建设楼房所用的沙石,是情报工程的原材料。

本编中的另一部分档案是情报报告、备忘录和特别报告,它们是就某个专题或某个时段的形势,在对相关情报进行研究后提交的分析报告。可以说它们是使用原材料修建的一个个房间。而在所有的情报文件中,最有分量和价值的是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相当于一座建成的楼房。本编中就有8-13、8-18两份专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不同于一般的情报,它通常是在国家评估办公室完成评估后,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美国情报部每周一次的会议取得最后同意,然后根据其内容、密级等,有针对性地分送到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中央情报局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观察及评估

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聚光灯首先照射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是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是核心的人物,他的健康状况、行为动机,特别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一) 毛泽东的健康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做法

1. 关于毛泽东的健康

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的情报主要是简短的情报信息电报,电报是由谁发回的因仍未解密不得而知,消息的来源则主要是在华外交官,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本编8-1、8-10选了其中两份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的情报信息电报。一份是传闻毛泽东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痛手术,这是波兰外交官从一位“曾参与会诊”的波兰医生那里获得的消息。这样的小道消息很不确切,况且,波兰医生参与会诊似乎也不太可能。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这样的消息也收入其报告中,说明它的消息渠道确实有

限,也说明他们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当然,美国情报部门对于各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健康都是十分关切的,因为通常来说,政治舞台上最大的戏剧性表现莫过于最高领导人的突然变故。

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关于毛泽东“老态龙钟”的情报信息电报,说毛泽东“渐老并很虚弱”,“已不能连贯地说话,并经常在说完一句话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消息来源是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暂且不论情况是否属实,可以想见,由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没有正常的联络渠道,美国的情报部门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状况的情报。

除了这类情报信息电报外,在其他的评估报告中也有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的观察和评估,但他们的观察和评估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可能”、“估计”、“似乎”这些词比比皆是。如美国情报评估人员估计“毛的健康和控制可能正在下滑”。^①在75岁时他的心血管病史使“其身体健康状况值得怀疑”。^②但他们无法确定毛泽东的实际状况,而估计他的体力虽有衰退,但“仍能保持他的领袖气质”。^③他的健康也“允许他进行积极的领导”,不过,他们觉得“难以估计毛的健康状况的前景”,只是相信如果毛泽东出现身体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那么持续不稳定的局面就会更加明显。如果他像列宁那样“苟延残喘”,那么“帮派主义就几乎肯定会滋长”。^④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多是捕风捉影和揣测,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他们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自然是关心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身体能否使他牢牢地控制住国内的政治形势,关系到中国的政局是否会出现变化。而衰老和死亡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使政治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连。

2.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美国情报部门就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进展,除了大量具体的观察外,也有比较全面的评估,其中1966年9月23日本编8-4文件,是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代主任阿伯特·史密斯(Abbot Smith)致国家评估委员会的关于“文革”期间中国的混乱形势的特别备忘录。这份文件发现中国“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充满矛盾,急速变化”。最高领导层“变戏法般地一再改变”,各级党组织受到红卫兵的攻击。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遭到了“实际上的公开反对”,这导致他认为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能执行他的基本政策的党。文件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靠说教应对实际问题屡受挫折。尽管毛泽东建立独立而强大的中国的目标得到广泛支持,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他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因

① 见本编8-5文件。

② 见本编8-20文件。

③ 见本编8-20文件。

④ 见本编8-13文件。

为试图用游击战时期的理论来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看来越来越不现实。一些知识分子及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毛泽东本人不这样认为,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希望用清党的办法来统一思想。该文件是对美国情报部门收集到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行概括整理后做出的客观陈述,它并没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是一般性的估计。

1967年5月25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即本编8-13文件。他综合各项情报及评估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对制度和社会的主要影响及其结果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稳定和秩序,但这也迫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很多计划,做出了暂时的让步。而当他发现很多决定是那些下级官员不经过他而自己做出的时候,他就“要寻找办法,重新确立他在全国的权威和主张”。而且,毛泽东相信一旦要推行他的总路线,“党内的反对派就必须被清除”。于是,到1965年11月,他决定采取行动。

第二,毛泽东“近乎迷信动员群众和向群众灌输他的学说可以做到一切”。他的做法是强调意识形态及进行政治斗争。因此,他把“不断革命”作为号召人民保持战斗精神的旗帜。中国高层的其他领导人并不反对“不断革命”,但他们更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并应该服从于不断推进建设现代中国的事业的利益”。这样一来,高层决策者的分歧加剧。

第三,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极为不满,同时也对中国的未来十分担心。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对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年轻一代特别不放心,害怕“苏联式修正主义可能影响中国,在他死后可能更会如此”。毛泽东曾经指定刘少奇为接班人,但当他对党机构越来越不信任时,他开始依靠解放军,并把林彪提拔起来。这种情况加剧了党内争斗,“那些身家性命系于刘氏的人正在努力挣扎,避免他的倒台而求生,而那些在林周围的人,可能正试图利用他的新承诺而获益。结果,政治气氛更紧张、更复杂了”。

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文化大革命”早期形势的基本估价。他们相信是毛泽东按照他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发动了这场运动。他们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它已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 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的观察

1967年9月8日,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一份关于周恩来与“文革”的特别报告,即本编8-17文件,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周恩来作为政府政策的主要发言人以及自1966年8月以来一直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三人组中的关键一员,因此需要格外重视。周恩来的与众不同和以往处理国内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经历早已被外国观察者描述过。美国的情报评估报告虽然更关注他在“文革”时期的表现,但对他本人的评价也有过去的影子,如“他出生于富裕的官宦人家并受到儒学传统的熏陶”,而中共的其他领导人

“大都出身卑微”。“他在西方世界的经历使他拥有更广阔和国际性的见解”而使很多外国人印象深刻并被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他在很多重大的外交谈判中“显示出他的坚定、谨慎和耐心”等等。

1. 周恩来的健康和工作能力

在外国观察家的眼中,周恩来是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的,因为他多年来经常是从早上十一点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这样的日程“足以让比他年轻的人筋疲力尽”。尽管他已69岁,但他还是承受了长时间的工作以及不断的压力。^①他要做的事情包括“频繁出席礼仪活动,管理中国庞大政府机构的日益增多的琐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其他人缺位,他承担了更多的事项,如1967年6月20~24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周恩来就以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身份出面迎接、宴请卡翁达,与他举行高峰会谈,并主持签订了贸易协定。在刘少奇无法行使职权时,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实际上是把周恩来当作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些都“给他增添了更耗时的工作”。而且,周恩来还“暂时代替了被围攻的陈毅、李先念和谭震林”,“承担起外交、财贸、农林这些国家机关的直接管理”。所以,“他是掌权的三巨头中唯一有足够精力应付庞大的政府机构日常事务的人”,而且,“哪里最忙就出现在哪里”。^②

除了精力过人外,周恩来的务实和灵活也备受关注。他处理问题一贯实际,中国目前虽然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但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弃相对实际的、较为节制的经济政策,周恩来在这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表明“中国政坛还没有完全失去清醒和理智”。^③总的来说,周恩来执行的是温和的路线,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立场,这使他有时表现出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方面不协调,但他同时又能保住其接近政治最高层的位置,这“既反映了他的机敏,又说明事实上他和任何官员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少了他们”。^④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发现,在整个“文革”期间,所有官方的宣传都说周恩来是在始终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然而,“事实上周恩来不断努力缓和他的上级所下达的极端政策,有时候他似乎做的是两码事”。他“行事周全,左右逢源,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技巧”。他能够多年来一直身居要职且地位相当稳固,说明他“在党内政治丛林中生存的能力堪比米高扬”。而作为“一个老练、儒雅的实用主义者”和“中国政治顶层的唯一明智的人”,他不仅有能力和耐力,而且拥有“抓住问题要领和化解危机的异乎寻常的高超技巧”。他“有才华和技巧去利用权力杠杆,并使国家朝向温和的政策”。^⑤换言之,周恩来是中国政坛上少见的能人。

2.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美国的情报评估报告认为周恩来的“顽强、谨慎

① 见本编8-13文件。

② 见本编8-17文件。

③ 见本编8-4文件。

④ 见本编8-17文件。

⑤ 见本编8-17文件。

和愿意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他应付从一开始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一部分的险恶的内部斗争有很大帮助。在整个受到官方鼓励的暴力和混乱期间,周恩来多次保护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当权的那些与他有共识的下属和盟友。在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人遭到攻击时,周多次挺身维护,也包括对军委所有副主席、副总理及政治局常委的保护。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周恩来虽然赞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路线,但是比起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他的言辞更为温和。他多次强调保持生产的重要性,公开反对“过火行为”,以及强调“治病救人”的必要性,并且他也成功地争取保存了大部分省级地方政府的权威。^①周恩来一直相当支持更理智的选择,如用三结合班子结束纷争,恢复秩序,呼吁重开学校,让躁动的年轻人回到校园,以及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工农业生产。尽管毛泽东支持的激进派对他不满,也试图打倒他,但他们没有做到,因为“需要他来保持国家不散架”。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周恩来也在大字报中被描绘成“‘文革’首席执行官”,他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争斗等等。但他同时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亲自接见众多的来自各省的代表,调解各派系的纷争,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②

总之,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认为周恩来“以相当大的信心和不断的努力,促使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乱中保持社会秩序”。当然,“在理智与务实的光鲜外表”之下,周恩来“可能与他的同事一样残酷无情”。他能在“靠近中共权力顶峰的并不稳固的位置上供职30年而幸存下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 关于林彪

在1966年9月本编8-5文件中,中央情报局关于林彪地位的特别报告注意到,林彪作为毛泽东在党内的第一副手于8月份出现了。他当时是唯一被官方媒体描述为毛泽东“亲如手足的同志”而显然正被培养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人。自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人员开始关注林彪,但他们并不确定他的具体角色,仅仅是猜测“他或许只是毛利用的工具,或许是和别人在一起干,也或许他自己是这场运动背后的发起者”。

该文件认为,林彪作为“中国最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其军事才能无可非议,但“文革”开始时还不到60岁的他却身体欠佳。他在1937年受伤后曾在苏联接受治疗。1950~1956年间,他淡出了公众视野。1957~1966年夏天之前,他也只是偶尔出现在公众场合。尽管如此,他们知道林彪仍处于党和军队的权力中心十多年。他在1955年进入政治局,1958年进入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取代失势的彭德怀,作为党的最高军事当局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林彪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器重,最主要的是他握有军权,其次是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日益不信任。而林彪在1959年任国防部长后一直

^① 见本编8-12文件。

^② 见本编8-17文件。

是毛泽东各项主张的热烈拥护者。1964年,林彪关于“政治统帅一切”的指示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使他格外讨得毛泽东的欢心。当刘少奇被逐出核心圈子后,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林彪把一批军人拉进了中央的核心。^①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对林彪能否做到使其接班人的预期成为现实给予了高度关注。

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中并无关于刘少奇的特别评估报告,而是散见在各个文件中,对于刘少奇的所谓罪行,他们是照搬了红卫兵的小册子,说他反毛泽东,是“修正主义的黑司令”,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还反对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反对集体化,主张个人主义,鼓吹“三和一减”和“三自一包”,但没有任何评论。^②

总的来说,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状况是关切但不确切的。可以说是雾里看花。但他们预见:“毛的许多信条和实践可能会被撇开”,尽管“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林彪则是政治新贵和明星,但“仍是个模糊的人物”。他是个阴沉难懂,看起来“一直行事低调”的人,美国人始终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在他们看来,林彪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他时进时退,见风使舵,力求在最安全的条件下得到最大化的利益。而周恩来的务实、理性、温和是人所共知的。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不妨碍他在具体的工作中采取灵活变通的做法。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成功地自保,但同时也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保护其他老干部,缓和极端政策,竭力稳定社会。

三、中央情报局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的评估

(一) 党内高层斗争与政治安全体制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华南,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整个中国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地方领导人被抓起来并游街示众,“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暴力冲突不断。本编8-12文件用了大量篇幅详细叙述各个地方的领导人受到攻击、“革命派”夺权以及各地发生骚乱的情况。

地方上的派系斗争其实是中央权力斗争的反映。本编8-20文件认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的原因实际上是领导集团的“争权夺利”。因为包括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新领导集团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大多数曾掌握政府和军队实权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文件把他们大致分成有野心并想要改变现状的激进派和在政府及军队中掌握实权的温和派或保守派。由于他们各有自己的支持者,所以他们之间的较量是从较低层次开始的。激进派靠动员群众,特别是利用红卫兵作为冲击政府和党的体制的先锋。受到攻击的实力派领导人并不甘心束手就擒,也鼓动自己的支持者予以反击,从而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当然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因为它“已经严重地瓦解了最高领导层”,党的

^① 见本编8-4文件。

^② 见本编8-7文件。

机关遭到破坏,也使党从结构上受到了损害。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承担起过多的非军事任务,无疑会影响它的战斗力。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人员也试图从体制上去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的原因,于是做了一份题为“中共:政治安全体制”的长篇报告,它分为两卷:第一卷是概述中共政治安全体制从20世纪20年代创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965年的历程;第二卷即本编8-21文件则是关于1965年秋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间的情况,题为“破坏与重建,1965~1969年”。

这份长达5万字的报告对中共的政治安全体制的变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它所谓的政治安全体制实际上就是党的高层干部管理体制。它揭示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要对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干部管理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最初的做法是整顿书记处、办公厅,弃用中央社会部,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公安部、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人进行大换血。中央各部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命运也是一样。而最终的结果是上述所有机构几乎全部都瘫痪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小圈子,即“中央文革小组”,由忠于他的人直接负责党的最高事务和干部的审查、管理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受政治局领导,但政治局常委会实际上成了摆设。军队系统也是这样,“全军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排挤了中央军委的领导,直接插手军队事务。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的说法,“文革”期间负责政治安全的主要是三个机关,一是“中央文革小组”,二是中央军委,三是由康生、谢富治和汪东兴组成并直接向毛泽东和林彪汇报的“政治安全处”。他们都可以参与确定审查被逮捕的党的领导人的专案组的人选,并在指导基层组织进行“文化大革命”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对于党的高级干部的最后“裁决”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和林彪可以做出。

在毛泽东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在全国基层党和政府机关夺权,导致全国出现了混乱局面,军队被迫卷入其中,形势发展近乎失控。“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都无法承担起它被寄予希望的责任,不得不进行重组。而毛泽东最根本的目的是要重建党的体制,首先是在思想上整党,然后是从组织上纯洁队伍。其实就是要清除异己,搬倒旧体制中的反对派,建立完全接受和按照毛泽东的意愿行事的新体制,并用这样的新体制去塑造中国社会。结果就是在中央逐步形成了由毛泽东和林彪所信任的人组成的越来越小的核心领导层,他们成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部,他们以中央机关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指令,并通过派出工宣队、支左小组等开展对全国的控制。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整个党的结构几乎完全解体了。

为了重建党,中央提出要在基层吸引“经得起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参加,为党补充“新鲜血液”。“文革”期间,基层的干部管理主要由各地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政工部门负责,军队的干部管理则由中央军委指派的政治工作组负责。这样形成的干部队伍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得到了确认。林彪成功地将与他有着特殊关系的几个军人提升到了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位置,他们“将在决定林彪是否能稳固他最终作为毛的继承人并执行毛

的路线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九大”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会，是要继续使“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大会，也是正式确立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大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势的人进入了政治局，而政治局常委会最终控制了党的决定和党的体制。

（二）中央情报局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干扰所做的分析与评估

1. 经济

1967年2月和3月，中央情报局就“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分别提出本编8-8、8-11文件。虽然他们认为“此时要做这样的评估是有困难的，因为虽然有大量的信息来源，但多数是零碎的，难以审视经济形势的全貌”，但还是从整体和国民经济的几个具体方面如工业、农业、食品和消费品供应、交通运输、对外贸易进行了考察。

本编8-8文件说，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似乎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农村和工厂，但1967年1月却在试图抑制过快发展的势头。“这种政策上的突然变化也许最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受到伤害”，但还没有处于全面的经济危机。“政府看起来已经成功地防止了‘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各个方面的干扰加深，尽管能否继续这样做还不能确定。”文件发现，“尽管有关生产停顿的报道陆续有闻，但没有证据显示有哪个工业部门的全面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也没有确切证据显示‘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农业”。交通运输系统的效率有所提高。供应方面，在各地串联的红卫兵所得到的食物和衣物，超出了他们作为学生所应有的配额，结果可能导致食物和衣物供给的减少。

3月份本编8-11文件部分地证实了2月份本编8-8文件中的猜测，即北京已经在减缓“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势头而努力恢复中国的经济秩序。政府正逐步修补较早时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混乱的过度行为。军队在经济运行和管理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如控制食品分配，组织春耕、帮助管理工厂的生产等。政府也成功地克服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产生的影响交通运输的个别混乱情况。文件认为，北京短期内采取的措施虽然在削弱经济政策的激进化，但是交通、通讯、食物分配以及对外贸易还是受到了负面影响。

1968年本编8-18文件所做的关于中国当前局势和前景的国家情报评估也指出，1967年的工业生产受到社会秩序混乱的影响，虽然农业生产因为当年“异乎寻常的好天气”而收成不错，但靠天吃饭不可能总有天老爷照顾。由于工业生产下降、失业问题与教育培训的缺乏，经济前景堪忧。

2. 人民生活与社会治安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砸烂“公、检、法”，使得党及其各级组织的复杂网络和曾经强有力的国家机器都陷于瘫痪之中，于是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混乱，虽然中央动用军队取代党的干部和警察维护社会秩序，但他们实际上根本无法阻止形势的恶化。此时，黑市交易、卖淫、赌博、青少年犯罪等问题纷纷涌现。1968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一份题为“无序在共产党中国的蔓延”的特别报告，即本编8-19文件，对当时中国的混乱局面，特别是社会治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他们认为，黑市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地方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所需的基本商品，

另一个原因是武斗已经干扰了工厂和农村日常的生产,导致商品短缺。而由于很多人无所事事,违法乱纪的情况也多了起来,小偷小摸比较普遍。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产、停课闹革命,很多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有了空闲,但又没有可以打发时间的娱乐,结果,不少人都把空余时间花到赌博上去碰运气。也是由于学校停课,青少年犯罪成为严重的问题。而且,曾经被清除了的卖淫现象也开始增多。

政府也力图解决日益增长的违法和混乱,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公审、扣发津贴、发动新的群众运动、组织平民纠察队以及鼓励居民邻里之间组织自己的治安队等。评估报告对以上情况都进行了详细描述。报告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并且无法有效解决,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央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纵容,他们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却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任意妄为。另一个原因是派系斗争,各有保护伞的帮派彼此武斗也是混乱之源。而军队想结束中国的混乱及非法活动的努力效果不大。因为“只要激烈的政治较量——全国的和地方的——不解决,在中国似乎不可能恢复社会秩序”。

中国国内的混乱形式也波及了香港。1967年5~8月,香港也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并与北京发生的冲击英国大使馆事件遥相呼应。本编8·15文件对这些事件予以了关注,并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香港本地的激进分子采取了主动行动,而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要收复香港的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

(三) 中央情报局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所做的评估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尽管政治危机使领导层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事务上,但中国还是保持了相对积极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保持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已经确定的立场和政策”。^①

在所有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国情报评估者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他们发现,“文革”期间,党内斗争似乎“导致媒体总体上放松了对越南和对外事务的注意”。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放弃或减弱它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文化大革命”显然没有影响通过中国的铁路向北越运送货物。“苏联的石化溶剂、捷克斯洛伐克的小口径步枪和弹药,以及罗马尼亚的石油和钢铁产品,都通过这些线路转运到了北越。”^②所以,美国的情报评估报告认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支持河内打持久战”。^③

除了红卫兵的准备“随时打仗”的极夸张说法外,美国的情报评估人员认为中国目前的动乱主要集中在国内,因而估计“最近不太可能出现中国出兵干涉越南战争的情形”。不过,他们认为将来形势的发展无法预测,因为不知道中国会由谁来掌权,掌权者会对越南战争的问题怎么处理。所以,他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混乱将有可能使目前中国谨慎的越南政策急剧终止,我们要小心。”他们还预言,北越人夹在强烈反苏的中国和苏联之间,“处境不妙”,如果“中国可能因其作为更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盟友,最终导致失去它对河内的影响力”的话,

① 见本编8-11文件。

② 见本编8-11文件。

③ 见本编8-13文件。

“可能会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机会，特别是如果苏联有心鼓励河内考虑政治解决方法的话”。^①正因为如此，中国不希望越南与美国进行认真的谈判。^②

中苏关系破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又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美国的情报评估报告认为，“文革”期间，中国看起来更不可能与苏联妥协，中苏贸易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③而美国也十分关心中国高层是否存在着表面现象以外的争论，比如当美国军队大规模地介入越南战争的话，中国会不会与美国开战，中国是否会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④不过，他们相信，由于中苏关系处于“冰冻状态”，北京“狂热的反苏路线”实际上排除了共产党国家在越南采取统一行动的可能。^⑤

1967年3月1日，国务院情报研究所提交了一份关于“文革”期间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本编8-9文件。他们看到，中国已向第三世界国家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改变中国基本的对外政策，中国会更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同时用经济援助和其他外交手段竭力安抚这些国家。但由于中国在对外事务上的极左行为以及中国国内的混乱，加上其他复杂因素，中国的国际声望降到最低点。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态度是比较谨慎的。尽管中国处于政治挂帅和反帝反修最狂热的阶段，但中国也在努力争取发展与西欧和日本的贸易。

总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还在继续执行过去几年一直实行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就是不懈地和不妥协地争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超群出众，在亚非世界中处于领导地位，与美苏为敌，以及有选择地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美国的情报评估还认为，“国家内部力量的变化可能但不是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政策导向”，也就是说，如果国内采取的是更温和的政策，那么它可能会采取比较宽松的对外政策，但是，中国要适应世界政治的现实，取得与其战略能力一致的世界地位，还需要各种因素和国际形势发展制造出的压力。^⑥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情报评估人员似乎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关系。

四、关于本编情报评估分析报告的价值评估

本编收录的21份文件中，只有一份是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报告，其他全部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特别是中央情报局情报处的信息报告和评估报告。那一份国务院的报告专门讲的是中国的对外政策，而其他报告都是关于中国的“内政”。

美国情报信息报告及评估报告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戏剧，它有开场、转折、高潮，有阴谋、攻击、反击，一幕幕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只是不知道它将在什么

① 见本编8-4文件。

② 见本编8-18文件。

③ 见本编8-9文件。

④ 见本编8-13文件。

⑤ 见本编8-18文件。

⑥ 见本编8-13文件。